

中日模糊限制语的价意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武蔵野大学グローバルスタディーズ研究所 公開日: 2022-03-22 キーワード: 新冠肺炎疫情, 模糊限制, 价意 作成者: , 琳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mu.repo.nii.ac.jp/records/1716

(研究論文)

中日模糊限制语的评价意义研究

—以新冠肺炎疫情话语为例—

中日のヘッジ表現に関する評価意義の研究

—COVID-19 ディスコースを中心に—

卢琳

キーワード：新冠肺炎疫情话语、模糊限制语、评价意义

1. 引言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于1923年发表的题为《论模糊性》一文中指出“语言或多或少是模糊的”（伯特兰·罗素,1990:20）。乔治·莱考夫（1973）首次在语言研究中引入“hedge”概念，并把其定义为“使事物变得不同程度模糊的词语（words whose job is to make things fuzzier or less fuzzy）”（乔治·莱考夫,1973:471）。

学界对模糊限制语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于对模糊限制语的界定、特征、分类、表现形式等（何自然,1985;何济生 姜晓蕙,1994;陈林华 李福印,1994;董娜,2003）。随着对模糊限制语的研究深入，基于礼貌原则、人际功能、交际功能等语用功能的相关研究大量涌现（周红 钱纪芳,2008;李佐文,2001;戴建东,2002）。此外，也有研究探讨机构话语、学术话语、不同语体等的模糊限制语使用现象（黄萍,2010;蒋婷,2006;赵英玲,1999）。综上，以往模糊限制语的研究很少关注媒体外交话语，且理论视域较为狭窄，对模糊限制语新议题的关注不够（任育新,2014:52），虽有跨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但中日模糊限制语的相关对比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中日外交部（外务省）例行记者会有关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议题的转写文本中模糊限制语的分布情况，探讨中日模糊限制语体现出怎样的评价意义。

2. 模糊限制语

目前，对模糊限制语的定义尚未统一。学者的立场不同，对模糊限制语的定义不尽相同（李凝,2018:2）。以乔治·莱考夫（1973）对模糊限制语的定义为起点，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模糊限制语进行了定义。Brown & Levinson（1987）认为“模糊限制语是可以改变谓词或名词短语真值程度的词或词组。也就是说，该话语是部分的，或者仅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或者它比可能预期的更真实和完整。”Yule（1996）在讨论合作原则时，提到了模糊限制语，指出：“在英语中，对于合作互动而言，质准则的重要性可以通过用来表明我们所说的话可能并不完全准确的表达数量来最好地衡量。这种谨慎的注释或模糊限定语也可以用来表明说话者意识到量准则。之后 Yule（2010）又给模糊限制语下了定义：“模糊限制语可以被定义为用于表现出我们不太确定我们所说的话充分

正确或完整的词或短语”。基于此，本研究将模糊限制语界定为说话人在外交场合，出于某种考量（表明立场、缓和语气、人际和谐等），回避断定，并采取陈述立场、给予建议等（刘风光 刘诗宇,2020:769）表达方式。

关于模糊限制语的类型，学界从词性、语用、语义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了分类（入戸野みはる,2004;高晓芳 张琴,2002）。乔治·莱考夫（1973）虽然没有对模糊限制语进行具体的分类，但是列举了英语模糊限制语的例子。Zadeh（1972）将模糊限制语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修饰模糊词的。第二类模糊限制语的作用是说明它们从哪些方面作用于模糊词的（伍铁平,1999:72）。迄今为止比较有影响的是 E.F.Prince 及其同事 J.Frader 和 C.Bosk 从语用的角度对模糊限制语的划分。模糊限制语按其语用功能，可分为变动型模糊限制语（approximators）和缓和型模糊限制语（shields）（董娜,2003:29）。变动型模糊限制语又可分为程度变动型模糊限制语（adaptors）和范围变动型模糊限制语（rounders）。缓和型模糊限制语又可分为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plausible shields）和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attribute shields）。模糊限制语分类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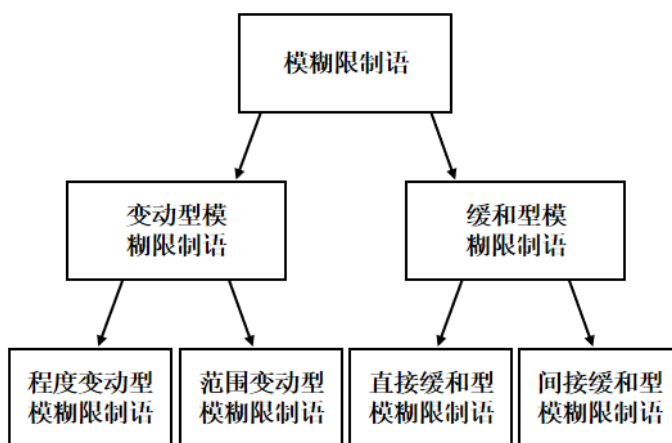


图1 模糊限制语分类

变动型模糊限制语可以改变话语结构的原意，或根据实际情况对原来话语意义作出某种程度的修正，或给原话语确定一个变动的范围。其两个分类，即程度变动型模糊限制语指限制变动程度的模糊性词语或结构，表示话语真实程度的变动。如汉语中的“稍稍”、“有点（儿）”，日语中的「すこし」、「かなり」等。范围变动型模糊限制语指限制变动范围的模糊性词语或结构。如汉语中的“将近”、“约”，日语中的「およそ」、「約」等。缓和型模糊限制语不改变话语结构的原意。使用缓和型模糊限制语相当于增加了一个说明，表示话语是说话人本人或第三者的看法，从而使话语原有的肯定语气趋向缓和。其两个分类，即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表示说话人对某事所作的直接猜测，或指说话人表示他对某事持有的犹疑态度。如汉语中的“我认为”、“我怀疑”，日语中的「思う」、「感じる」等。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不直接表示说话人本人的推测或犹疑，而是引用第三者的看法，从而间接地表达说话人对某事情的态度、看法或认识；有的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表示不确定的或缺少把握的信息来源。如汉语中的“据某某讲”、“有记载说”，日语中的「（～）によると～そうだ」、「らしい」等（何自然 冉永平,2010:178-183）。

综上,本研究根据对模糊限制语的界定,并参照 E.F.Prince 及其同事 J.Frader 和 C.Bosk 对模糊限制语的语用分类,具体解决以下问题:1)中日疫情话语中,模糊限制语的分布情况如何?2)中日疫情话语中,模糊限制语体现了怎样的评价意义?

3. 研究设计

本研究基于 2020 年 1 月—4 月中日外交部(外务省)例行记者会有关疫情议题的转写文本,建立了中日外交部(外务省)疫情例行记者会可比小型语料库。日本外务省基本每周举行一次例行记者会,场次较少,故日语语料为 2020 年 1 月—4 月全部 11 场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的转写文本。在疫情期间,中国外交部基本每天都会举行例行记者会,场次较多,为了保证中日外交部(外务省)疫情例行记者会小型语料库的可比性,故对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场次进行随机抽样,抽取其中的 11 场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的转写文本作为语料。依据 E.F.Prince 及其同事 J.Frader 和 C.Bosk 对模糊限制语的语用分类,在可比语料库中遍历查找,利用 UAM CorpusTool 3.0 和 KH Coder 3 作为词汇提取的辅助分析工具,并对中日模糊限制语的类型分布及评价资源的使用频率差异进行百分比检验。通过阅读检索行、考察上下文语境等,同时为了尽量避免主观性造成的数据误差,本研究采用同行商议、同伴合作和自我审查等方式,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刘风光等,2019:45;刘风光 刘诗宇,2020:772)。表 1 为中日外交部(外务省)疫情例行记者会可比语料库统计结果。

表 1 中日外交部(外务省)疫情例行记者会可比语料库统计结果

月份	汉语		日语	
	样本数	语料长度(字数)	样本数	语料长度(字数)
1 月	0	0	1	3914
2 月	4	11138	4	5161
3 月	5	9685	3	2326
4 月	2	3434	3	4060
总计	11	24257	11	15461

4. 中日模糊限制语类别及分布

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作为宣传本国对外政策的媒体外交场合,通过记者与发言人之间的问答,与第三方公众建立关系联结,能够让外界更好地了解自己,有助于提升本国形象。模糊限制语是媒体外交中不可替代的一种言语技巧,是保证外交活动成功的一种重要手段(魏在江,2006:45)。

表 2 中日模糊限制语类别分布对比

类别	表达方式	中国	日本	P
----	------	----	----	---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变 动 型 模 糊 限 制 语	程 度 变 动 型 模 糊 限 制 语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本着对人民健康 高度 负责的态度，采取了 最全面、最严格 的防控举措…… ～日本国内での感染の拡大を防止するということを 最も重要な 課題として～	310	40.31%	113	31.13%	0.00
	范 围 变 动 型 模 糊 限 制 语	在同意方繁忙交流期间……向大家介绍新冠肺炎的症状特点、预防常识和治疗手段，直播观看量 近 70 万次…… 当然、今回の便が飛び立った 前後 以降の状況も含めて～	263	34.20%	92	25.34%	0.00
	小 计		573	74.51%	205	56.47%	
缓 和 型 模 糊 限 制 语	直 接 缓 和 型 模 糊 限 制 语	我想 这正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展现的担当和中国人民的善良和无私奉献。 ～しっかり検討していきたいという立場なんだと思います。	141	18.34%	127	34.99%	0.004
	间 接 缓 和 型 模 糊 限 制 语	…… 加拿大卫生部长……认为 禁止入境的做法没有依据，也不合理。这与美方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 ～帰国を希望する邦人がまだ約140名いらっしゃるということで あります ～	55	7.15%	31	8.54%	0.583
	小 计		196	25.49%	158	43.53%	
总 计			769	100%	363	100%	

由表2的数据可知，中国外交部疫情例行记者会转写文本中共出现769次模糊限制语，约为日本的两倍有余。其中，变动型模糊限制语共出现573次，占全部模糊限制语的74.51%，最为常用。相对而言，缓和型模糊限制语使用频率要远低于变动型模糊限制语，共出现196次，仅占25.49%。日本外务省疫情例行记者会转写文本中共出现363次模糊限制语。其中，变动型模糊限制语使用频率要略高于缓和型模糊限制语，二者之间相差不是很大，分别出现205次和158次，占比分别为56.47%和43.53%。

中日外交部（外务省）疫情例行记者会转写文本中，程度变动型模糊限制语使用频率分别为40.31%和31.13%，但百分比统计检验结果显示，在5%置信水平上，二者对该类型模糊限制语的使用存在显著差异($p=0.00 < 0.05$)。就范围变动型模糊限制语而言，中日双方的使用频率分别为34.20%和25.34%，二者差异达到显著性意义($p=0.00 < 0.05$)。

故而可以看出,与日方发言人相比,中方发言人使用了较多的变动型模糊限制语,主要用于表达一方面中国抗击疫情,为世界各国赢得宝贵时间所作的努力,另一方面积极参与以世界卫生组织为首的国际性合作,共克时艰,同时回击了美国等对中国的无端指责和肆意诽谤。中日双方对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使用频率分别为 18.34%和 34.99%,二者对该类型模糊限制语的使用存在显著差异($p=0.004 < 0.05$)。在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方面,中日双方占比分别为 7.15%和 8.54%,二者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意义($p=0.583 > 0.05$)。故不难看出,日方相对使用了较多的缓和型模糊限制语,尤其对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的大量使用,表明由日方发言人所代表的日本官方对疫情所持的态度。通过使用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可以使语气趋于缓和,避免将己方的观点和意见强加于人(董娜,2003:32),符合日语表达习惯。

5. 中日模糊限制语评价意义分布对比

由马丁建立的评价理论是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对人际意义研究在词汇语义层面的拓展(蒋国东 陈许,2017:6)。具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方面:态度(attitude)、介入(engagement)和级差(graduation)。

级差可在两个可扩展的轴上进行运作,一个是根据:度或数量进行分级;另一个是根据描摹类别边界的原型和精确度进行分级(Martin & White,2005:137)。即前者为“语势(force)”,调节可分级的态度范畴的力度(volume),是:势(raise)还是弱勢(lower);后者为“聚焦(focus)”,是把不能分级的态度范畴分级,分明显(sharpen)和模糊(soften)(刘立华,2010:15)。

介入的方法之一是模糊陈述(hedging),由情态词和一些词汇来表达。模糊陈述表达了语言使用者的确定程度(王振华,2003:159)。因此,模糊限制语与评价理论,尤其是与评价理论的介入范畴和级差范畴能够进行很好的融合,进而可以实现模糊限制语所表达的评价意义。

5.1. 中日模糊限制语介入范畴评价意义

表 3 中日模糊限制语介入范畴评价意义分布对比

介入范畴			模糊限制语类型	中国		日本		P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对话性 压缩	否认	否定	程度变动型模糊限制语	4	1.28%	0	0%	0.047
		对立	程度变动型模糊限制语	51	30.77%	4	2.89%	0.00
	范围变动型模糊限制语		45	1				
	声明	一致	程度变动型模糊限制语	13	6.73%	2	1.16%	0.001
			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	8		0		
		宣布	程度变动型模糊限制语	0	0%	7	4.05%	0.00

		支持	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	35	11.22%	13	7.51%	0.092
对话性扩展	引发		程度变动型模糊限制语	15	43.59%	17	82.08%	0.00
			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	121		125		
	摘要	承认	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	15	4.81%	4	2.31%	0.095
		疏远	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	5	1.60%	0	0%	0.026

介入范畴可分为“单声 (monogloss)”和“多声 (heterogloss)”。总体来说, 仍然在“对话”“多声”的大框架下描述这些词汇语法资源的功能性, 将“多声”中的介入的功能归纳为对话性压缩 (dialogic contraction) 和对话性扩展 (dialogic expansion) (胡壮麟等,2008:327)。

对话性压缩可分为“否认” (disclaim) 和“声明” (proclaim), “否认”又可分为“否定” (deny) 和“对立” (counter)。“否定”表示反驳、拒绝; “对立”包含了一种让步的、相反的表达 (Martin & White,2005:97)。

“否定”资源:

由表 3 数据可知, 中日双方对表示“否定”资源的模糊限制语使用的极少, 中方仅有 4 次, 而日方没有使用“否定”资源。但百分比统计检验结果显示, 在 5%置信水平上, 二者对该策略的使用还是存在显著差异($p=0.047 < 0.05$)。

- (1) 这种做法既不道德, 也不负责, 不仅对美国自身的防疫工作丝毫没有帮助, 对促进国际社会的抗疫合作也丝毫没有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020 年 3 月 23 日)
- (2) 疫情当前, 世界各国应当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这时候试图转移视线、推卸责任, 不仅对本国的防疫工作丝毫没有帮助, 对促进国际社会防疫合作也丝毫没有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020 年 3 月 23 日)

例 (1) 与例 (2) 使用表示后接否定的程度变动型模糊限制语“丝毫”, 对美国借新冠病毒诋毁中国、电锅中国进行了驳斥。一方面与在场的听众进行关系联结, 让听众知道疫情面前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唯有携手合作才是战胜疫情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与不在场的潜在听众结盟, 表达中国面对疫情所展现出的大局观, 树立了良好的国家形象。最后, 否定是把肯定意见引入对话的一种方法, 但是承认其存在是为了反对它 (彭宣维等,2015:172), 即针对第三方美国不负责任地对中国污名化进行了否定。反衬出美国一贯抹黑中国的不道德做法, 体现出中国的大国担当。

“对立”资源:

中日双方在“对立”资源的使用上分别为 96 次和 5 次, 分别占比为 30.77%和 2.89%, 二者存在显著差异($p=0 < 0.05$)。

- (3) 这里我要说的是, 中印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人口超过 10 亿的大国, 在公共卫生领域面临共同挑战。中方愿同印方分享疫情防控、诊疗经验, 也愿根据印方需要, 进一步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020 年 3 月 23 日)

- (4) いずれにせよ今の段階でははっきりと予断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でも今後とも政府としては各地の動きを注意深く見守りながら、必要な措置をとっていくという立場には変わりはないとご理解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日本外務省发言人大鷹, 2020年2月26日) (无论如何, 在现阶段无法做出明确的预测, 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政府在密切关注各地动向的同时, 将会继续采取必要措施。)

例(3)使用的程度变动型模糊限制语“仅有”属于表示对比关系的对立资源, : 调两国人口庞大, 在应对新冠疫情上的难度超出人们的想象, 中方对此也是感同身受, 在自身仍在抗击疫情的同时, 还不忘对印度伸出援手, 体现出了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此次“抗疫”中展现出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与中国相较而言, 此时日本处于疫情的早期, 主要关注周边, 尤其是中国和韩国的疫情动态。故例(4)通过使用程度变动型模糊限制语“はっきり”+“ない”的否定形式介入, 反映出疫情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很难把握。

“声明”是指语篇中的声音通过将命题表示为非常可靠的, 从而压制或排除其他声音 (Martin & White, 2005:98)。又分为“一致”(concur)、“宣布”(pronounce)和“支持”(endorsement)。

“一致”资源:

就“一致”资源而言, 中日双方分别使用了21次与2次, 分别占比为6.73%和1.16%。双方对其使用的频率较低, 但二者使用差异仍然显著 ($p=0.001 < 0.05$)。

- (5) 至于你提到的医用口罩及生产口罩所需原材料出口的问题, 此前中国商务部已作出澄清, 明确指出, 中国政府没有针对口罩及其生产原材料出口设置过任何贸易管制措施, 企业可以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相关贸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020年3月9日)

- (6) ご案内のとおり, 中国の一部の地域, そして今回の韓国の一部の地域についての上陸について, 一定の措置が発表されているわけです。(日本外務省发言人大鷹, 2020年2月26日) (如您所见, 已经宣布对来自中国某些地区以及这次的韩国某些地区的入境者采取了一定措施。)

例(5)中使用程度变动型模糊限制语“明确”表达了显著性“一致”。援引贸易主管部门商务部的“内部声音”, 表达了中国的立场, 有利于把听话人或潜在的受众争取过来, 进行结盟。例(6)也是援引日本内部官方声音, 针对目前的疫情形势采取必要的措施。但对于疫情的认知, 尚不明晰, 如数据显示那样, 无法提供更多的内部声音作为依据。

“宣布”资源:

在“宣布”资源方面, 中方没有相应的表述。日方对“宣布”资源的使用与“一致”资源类似, 都较低, 共出现7次, 占比4.05%, 二者差异达到显著性 ($p=0 < 0.05$)。

- (7) それから発生源についてのお話ですけれども, これも当然政府として情報収集を全力を挙げてやりつつ, WHO を含む関係国際機関との情報交換等を緊密に行いながら, いろいろ状況の把握に努めているところです。(日本外務省发言人大鷹, 2020年2月12日) (关于新冠病毒溯源问题, 当然, 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来收集信息, 并且在与包括 WHO 在内的相关国际组织保持密切交流的同时, 努力掌握各种情况。)

例(7)使用程度变动型模糊限制语“全力を挙げて”，明确表明自己的介入，并且特别突出主体自我（彭宣维等,2015:200），可以看出发言人：调本国政府对疫情的重视，便于与潜在受众达成关系联结进而结盟。

“支持”资源：

中日双方对“支持”资源的使用分别为35次和13次，占比分别为11.22%和7.51%，二者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意义($p=0.092>0.05$)。

(8) 就连美国媒体和专家都对美政府措施表达了质疑，表示“美政府对华采取的限制措施恰恰是世卫组织反对的，美方正在从过分自信转变到恐慌和过分应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20年2月3日)

(9) こ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感染については、WHOも言っていますように、今でもかなり感染の拡大が進んでいる状況です。（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大鷹，2020年3月25日）（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所说，这种新冠病毒仍在广泛传播。）

例(8)和例(9)都是通过表示间接引用的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把外部意见说成是正确的、有效的、不可否认的或完全正当的（彭宣维等,2015:200）。其中例(8)借用美国本土媒体报道和专家的话语有力地对美国针对中国所采取的不当行为进行了回击。突出了中国主张的合法性。例(9)通过介入世卫组织的权威话语，一是对大众具有警戒作用，二是可以为日本政府进行相关行动增：合法性。

对话性扩展可分为“引发”(entertain)和“摘引”(attribute)。“引发”暗示某观点(通常是作者观点)只是多种观点中的一种，愿意把其他声音纳入对话空间，进行平等协商；“摘引”明确表示某观点来自外部声音，是对别人话语的转述，也是多种声音中的一种，从而扩大对话协商空间(蒋国东 陈许,2017:7)。“摘引”可进一步分为“承认”(acknowledge)和“疏远”(distance)。前者转述他人话语并表示愿意与他人话语统一立场，从而增加话语的对话性，后者则表示不愿为所转述的内容承担责任，所以虽然它通过引入他人立场扩大了对话空间，但这种对话空间是有限的(辛斌 吴玲莉,2018:2)。

“引发”资源：

中日双方都使用了大量的“引发”资源，分别为136次和142次，使用频次接近，但二者差异仍然显著($p=0<0.05$)。

(10) 中方愿继续本着公开透明和高度负责的态度，同各国加：合作，维护好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同时为地区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作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20年2月3日)

(11) そしてこの第4便を、帰国を希望されるできる限り多くの方々にご利用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大鷹，2020年2月5日）

(如果想返回日本的话，我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乘坐第四次包机航班。)

例(10)使用了表示意愿的动态性情态表达方式“中方愿”，表达了中国的一贯立场，即不管国际社会环境如何，本着负责任的大国态度，不仅对国内人民负责，还要为世界贡献中国力量，很好地与受众进行了情感联结，产生共鸣。例(11)使用“できる限り”和“思っております”两个表示“引发”资源的表达方式，此种介入包含了无法乘坐第四次包机航班回到日本的潜在可能性，由于是现阶段最后一次撤侨包机，今后如何尚无定数，会给人造成心理恐慌感，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调日本政府做了最大的努力，调节受众的期望，以便结盟。

“承认”资源：

从“承认”资源来看，中日双方使用的不多，分别为 15 次和 4 次，占比分别为 4.81% 和 2.31%。二者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性意义($p=0.095>0.05$)。

(1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正是由于中方采取：有力防控措施以及中国人民作出的巨大牺牲，才有效阻遏了疫情向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蔓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020 年 2 月 10 日）

(13) そして韓国政府もこれらの地域を「感染症特別管理地域」に指定して感染症危機警報を 4 段階の中で最も高い「深刻」、いわゆる「深刻」段階に引き上げているという状況がありました。（日本外務省发言人大鷹，2020 年 2 月 26 日）（韩国政府还将这些地区指定为“传染病特别控制区”，并将传染病危机预警提高到四个阶段中最高的“严重”，也就是“严重”阶段。）

例 (12) 间接引用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的观点，增：了话语的权威性，尤其是程度变动型模糊限制语“：有力”、“巨大”等的使用，表达了中国为防空疫情所采取的措施及付出的代价之甚，与受众共情，使用“正因为……才……”句式，：调了中国为世界疫情防控做出的巨大贡献，与受众共识。例 (13) 通过援引韩国政府官方话语，为本国（日本）针对韩国所采取的入境措施提供合法化依据。

“疏远”资源：

由表 3 可见，中方对“疏远”资源的使用为 5 次，占比为 1.60%；而日方没有使用“疏远”资源，二者使用差异依然显著 ($p=0.026<0.05$)。

(14) 最近是有个别西方人士提到所谓中国“政治宣传” (propaganda) 问题。我想问问那些阴阳怪气说风凉话的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20 年 3 月 30 日）

例 (14) 通过引用无出处的命题形式，取消了该命题的合法性。使用“所谓”间接对“政治宣传”的贴标签行为进行了否定。最后使用设问的修辞手法，进行提问，引起大家注意，进而：调对该命题的态度保持距离，启发人们的思考（卢琳 张松仪,2020:63、彭宣维等,2015:247）。

5.2. 中日模糊限制语级差范畴评价意义

表 4 中日模糊限制语级差范畴评价意义分布对比

级差范畴		模糊限制语的类型	中国		日本		P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语势	量化	程度变动型模糊限制语	5	28.36%	5	30%	0.00
		范围变动型模糊限制语	90		22		
	：化	程度变动型模糊限制语	209	62.39%	56	62.22%	
聚焦	明显	程度变动型模糊限制语	25	7.46%	7	7.78%	0.048
	模糊	范围变动型模糊限制语	6	1.79%	0	0%	0.015

“量化”：

在马丁的评价理论中，“量化”指对实体的数目、大小、重量、分布和范围的非精确估计量。一方面，“量化”可以通过修饰态度词来调节态度意的：弱。另一方面，“量化”也可以通过语境引发某种态度义（彭宣维等,2015:255）。如表4所示，中日双方对“量化”资源的使用分别为95次和27次，分别占比28.36%和30%，二者存在显著差异（ $p=0<0.05$ ）。

(1) 世卫组织最近表示，新加坡、韩国等一些国家正是充分利用了中方为世界争取的宝贵时间，采取必要防控措施，才使疫情蔓延得到了控制。而在这段宝贵的时间里，美方又做了什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020年3月23日）

(2) チャーター機の派遣等あらゆる手段を追求し，希望される邦人全員が帰国できるよう各方面との調整を進めてきており～（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大鷹，2020年2月12日）

（我们正采取包括包机在内的一切措施，并与各方进行协调，以便所有希望回国的日本人都能返回日本。）

“最近”是属于邻近性跨度级差，表示时间的相对位置（彭宣维等,2005:268）。例（1）表达了一直以来世卫组织对中国抗击疫情的认可及其赞扬，以此来影射美国的不作为。例（2）使用了表示总括数量的词“あらゆる”、“各方面”，可以看出相关词汇的使用有助于树立日本政府积极的正面形象，旨在：调快速的响应及果断的行动力。

“：化”：

在评价理论中，“：化”是对品质和过程进行分级的语言资源（彭宣维等,2015:284）。从表4可以看到，中日双方对“：化”资源的使用分别为209次和56次，在各自的级差范畴出现的频率都很高，分别为62.39%和62.22%，但二者使用差异依然显著（ $p=0<0.05$ ）。

(3)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本着对人民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措，很多举措远超出《国际卫生条例》要求，被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称赞为“设立了应对疫情的新标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20年2月3日）

(4) ただ，日本は相当早い方に入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と思います。（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大鷹，2020年1月29日）（我认为毫无疑问日本处于早期阶段。）

例（3）中，程度变动型模糊限制语“最～”、“远～”等表示品质强化及过程：化的相关程度：化词汇的使用，突显了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人民至上的理念，对疫情严防死守，提出抗击疫情“中国方案”，与“设立了应对疫情的新标杆”相呼应。例（4）中的“相当”是属于过程：化的孤立型：化词，后接表示动作力度的补语“早い方”，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意在：调应急响应快，撤侨及时。最后以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思います”结句，缓和断言的程度，使得相关表达不显生硬。

“明显”：

“明显”是一种锐化聚焦，表示绝对意义的词可以产生聚焦作用（彭宣维等,2015:338）。中日双方分别使用了25次和7次，在各自的级差范畴内分别占比为7.46%和7.78%，使用差异显著（ $p=0<0.048$ ）。

(5) 中方愿继续同各方一道共同应对疫情挑战，为早日彻底战胜疫情，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020年4月7日）

(6) 在留邦人及び海外渡航者の安全確保に向け、引き続き万全の対応をとって
いく考えです。(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大鷹, 2020年2月12日)(我们将继续
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以确保侨民和海外旅客的安全。)

例(5)中的“彻底”与例(6)中的“万全”都属于真实性聚焦。“彻底”一词的使用, 表达了中国对战胜疫情的美好愿望, 同时也显示了战胜疫情的必胜信心。“万全”一词的使用, 可以显示出对疫情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 尤其是搭配使用“引き続き”, 预设了日本政府一直以来为应对疫情所作的努力, 向大众彰显了其积极作为。

“模糊”:

“模糊”是一种柔化聚焦, 表示模棱两可意义的词可以产生聚焦作用(彭宣维等, 2015:338)。中方使用了6次, 占比1.79%, 而日方没有使用相应的词语, 二者使用差异显著($p=0.015<0.05$)。

(7) 其实大家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以一种近乎惨烈的方式再次证明, 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020年3月30日)

例(7)通过使用范围变动型模糊限制语“近乎”, 描摹了疫情给人类造成的严重影响, 从侧面验证了我们人类是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反过来也: 调了正是由于我们是命运共同体, 才要更加的通力合作, 早日战胜疫情。

6. 结论

模糊限制语可以结合具体语境下的语用功能, 对话语做出间接的评价(何自然 冉永平, 2010:177)。新闻发言人代表本国官方在例行记者会上的发言属于机构话语, 其中合理地使用模糊限制语可以更好地对外表明本国立场。同时不仅能够与在场的听众进行关系联结, 更是与不在场的第三方受众进行结盟, 塑造国家形象, 维护国际关系(刘风光等, 2019:48)。通过对比分析中日外交部(外务省)关于疫情的例行记者会转写文本中模糊限制语的使用, 以及由此体现出的评价意义, 发现, 由于处在国际社会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持续高度关注, 中方对模糊限制语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对外发声; 相较之下, 日方国内此时还基本处于疫情的萌芽阶段, 故模糊限制语的使用主要用于表达早期积极预防及从中国撤侨的对内发声。

首先中方大量地使用了变动型模糊限制语, 用于介入范畴对话性压缩资源和级差范畴评价意义的表达。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卓有成效的疫情防控, 向世界发出了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合作抗“疫”的心声及表达了战胜疫情的坚定决心。另一方面, 对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和个人对中国进行污名化的行为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与中方相比, 日方虽然在变动型模糊限制语的使用上没有中方使用的丰富, 且数量上也远逊于中方, 但与自身相比, 要高于对缓和型模糊限制语的使用, 与中方相似, 日方主要用于: 调在疫情防控上的积极作为, 同时又旨在展现在保护海外侨胞上的能力, 与民众共情, 结成联盟, 构建积极的评价意义。

其次, 在缓和型模糊限制语的选择上, 中日双方都是较多地使用了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日方多于中方。通过“引发”资源, 日方有意缓和和相关话语的主观断言, 留有余地。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在防控及应对上摸索前进; 中方更多的是用于阐述自身的立场, 维护人际和谐。在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方面, 相较于直接缓和型模糊限制语, 中日双方使用的都很少, 相差无几。利用“摘引”资源, 通过间接转述

第三方话语，中国在应对此次疫情的表现得到了以世卫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和积极评价，也为中国讲好抗“疫”故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引述表达，也为日方针对疫情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合法化依据。

本研究以定量描述和定性分析为主，探讨了模糊限制语的界定，并通过对比中日关于疫情的例行记者会转写文本中模糊限制语体现出的评价意义的异同，为讲好中国抗“疫”故事，传播国际话语提供启示。

谢辞

本研究得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资助（202008210406）

参考文献

- [1] 入戸野みはる(2004)「ヘッジの形(フォーム)とその機能:友人間の会話に見る」 *New direction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of Japanese* くろしお出版.
- [2] Brown,P.&Levinson,S.(1987) *Politeness: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 Lakoff,G.(1973)Hedges: A study in meaning Criteria and the logic of fuzzy concepts.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2 (4): 458-508.
- [4] Martin,J.R.& White, P. R. R.(2005)*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Appraisal in Englis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5] Yule,G.(1996)*Pragma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6] Yule,G.(2010)*The Study of Language(4th e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7] Zadeh, L.A.(1972)A fuzzy-set-theoretic interpretation of linguistic hedges. *Journal of Cybernetics*, (2):4-34.
- [8] 伯特兰·罗素 (1990) 「论模糊性」杨清 吴涌涛译『模糊系统与数学』, 4 (1) : 16—22.
- [9] 陈林华 李福印 (1994) 「交际中的模糊限制语」『外国语』93 (5) : 55-59.
- [10] 戴建东 (2002) 「试论模糊语言的交际功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5 (6) : 21-25.
- [11] 董娜 (2003) 「模糊限制语的界定及分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16 (4) : 28-34.
- [12] 高晓芳 张琴 (2002) 「模糊限制语:分类与应用」『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8 (5) : 89-91.
- [13] 何济生 姜晓蕙 (1994) 「模糊限制语的语义特征及分类」『山东外语教学』55 (2) : 6-9.
- [14] 何自然 (1985) 「模糊限制语与言语交际」『外国语』39 (5) : 27—31.
- [15] 何自然 冉永平 (2010) 『新编语用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6] 胡壮麟 朱永生 张德禄 李战子 (2008)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 [17] 黄萍 (2010) 「法律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人际意义——以中文判决书为例」『学术交流』191 (2) : 159-161.
- [18] 蒋国东 陈许 (2017) 「对外新闻中的“一带一路”——评价理论介入系统下的话语分析」『外语研究』165 (5) : 6-9.
- [19] 蒋婷 (2006) 「论学术英语中的情态模糊限制语——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外语电化教学』110 (4) : 47-51+57.
- [20] 李凝 (2018) 『再论日语模糊限制语』知识产权出版社.
- [21] 李佐文.2001「模糊限制语的人际功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3) : 1-3.
- [22] 刘风光 刘诗宇.2020「外交话语中规避回答策略及其仪式化关系联结」『现代外语』43 (6) : 769-780.

- [23] 刘风光 石文瑞 邓耀臣.2019「中美政治建议言语行为对比研究——以外交话语为例」『外语教学』40(2):44-50.
- [24] 王振华「评价系统及其运作——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新发展」载刘立华主编『评价理论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第15页.
- [25] 卢琳 张松仪.2020「日本主流媒体有关“一带一路”报道中的介入系统分析」『渭南师范学院学报』35(11):61-68.
- [26] 彭宣维等.2015『汉英评价意义分析手册:评价语料库的语料处理原则与研制方案』北京大学出版社.
- [27] 任育新.2014「国外建议行为研究述评」『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4):49-54.
- [28] 王振华.2003『介入:语言互动中的一种评价视角』河南大学.
- [29] 魏在江.2006「从外交语言看语用含糊」『外语学刊』129(2):45-51.
- [30] 伍铁平.1999『模糊限制语』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31] 辛斌 吴玲莉.2018「中美媒体有关“一带一路”倡议报道中的介入资源分析」『外语研究』(6):1-7+112.
- [32] 赵英玲.1999「模糊限制语在科技语体中的语用功能刍论」『山东外语教学』74(1):86-88.
- [33] 周红 钱纪芳.2008「模糊限制语——表达礼貌的语言策略」『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23-28.

武蔵野大学グローバルスタディーズ研究所 客員研究員
大连外国语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